

巡抚江苏与李鸿章早期国防思想

黄飞^{*1}

【摘要】: 同治初年巡抚江苏对李鸿章国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内患不足虑,“长久之患在西人”;中外藩篱已失,洋人船舰兵临中国沿海;邻国日本已经开始自强,“附丽于我”还是“谋我”取决于中国能否自强。不同于左宗棠力主发展轮船制造,李鸿章提出以制造水陆皆可用的枪炮为中心,辅以小轮船制造的道路。巡抚江苏也促使李鸿章形成“备夷防变”思想体系,此体系蕴含了他对国防安全的规划,是一种囊括本土和海外部署的“大国家安全”构想。

【关键词】: 李鸿章; 同治初年; 江苏巡抚; 国防; 海防

【中图分类号】: K256; K825.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7)02—0083—07

关于李鸿章的国防思想,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由于李鸿章力主发展海防并对晚清海防产生重要影响,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学界在考察李鸿章海防思想时主要考察其出任直隶总督之后,特别是同光之际“塞防与海防之争”时期及其后李鸿章的思想^①。对“塞防与海防之争”之前李鸿章的国防思想,学界关注点集中于李鸿章发展军事工业的实践活动,并将此时期作为李鸿章营建海防物质基础的阶段^②。然而,同治时期,李鸿章是否已产生大力发展海防的认识?他对国防有何具体认知?此种认知的形成原因是什么?本文希望对学界关注不足的同治初年(同治元年至六年)李鸿章的国防思想进行考察,探讨出任江苏巡抚后李鸿章对国防环境的认知、践行举措与军工策略,以及此间经历对其国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

一、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新认识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太平天国的迅速壮大,让处于危机之中的清廷不得不思考解决之道。咸丰十年十二月,恭亲王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分析清政府面临的形势,“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③。此奏折也被看作洋务运动的肇端。奕訢等人分析了清政府所面临的威胁,认为内乱才是最大威胁,外来侵略等国防威胁次之:“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惟有隐消其鸷疾之气,而未遽张以撻伐之威。”^④其后,奕訢等又上奏阐述从根本上

¹ 作者简介:黄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² ①关于李鸿章与晚清国防,沈谦芳和章育良二人从宏观上讨论了李鸿章的国防思想(沈谦芳:《李鸿章的国防思想》,《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2期;章育良:《李鸿章的国防观》,《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6期);谢茂发、李京波在《近三十年来国内晚清海防思想》学术综述中涉及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研究的梳理(《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施渡桥对1870年至1894年李鸿章的战略防御思想进行考察,认为其经历了消极—积极—消极的曲折转变过程(《论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威海莹将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分为四个阶段,认为不应该简单评价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而是应当从其思想发展过程做具体分析(《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安徽史学》1997年第2期);翁飞从两次海防大筹议出发探讨了李鸿章的海防思想(《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建设:两次海防大筹议过程探讨》,《学术界》2014年第10期)。

³ ②威海莹:《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安徽史学》1997年第2期。

⁴ ③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续修四库全书》第418册,第315页下。

⁵ ④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续修四库全书》第418册,第315页上。

解决清政府困局的方法，即实行“自强之术”，而首要即“练兵”。“练兵”不仅可以增强清政府的平叛能力，也能加强制约夷人的国防力量，“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备，以期经久无患”。奕訢等还认为“内患除，则外患自泯”^⑥。

同治元年二月，太平军陷松江、太仓诸属，上海势危，曾国藩奏请李鸿章率军驰援上海。三月，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十月补授江苏巡抚^⑦。在出任江苏巡抚之前，李鸿章曾经担任两淮盐运使，办理淮扬水师。当时李鸿章有关海军的知识还仅局限于传统的中国水师，对于近代西方海军尚未有多少认识^⑧。而在同治元年前往江苏后，李鸿章的视野大为开阔，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认识也与奕訢等人颇有不同。

（一）“长久之患在西人”

上海是中外交流重地，上海见闻对李鸿章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李鸿章在上海面临曾国藩未曾面临的形势，他为西方对中国的明显侵略和西方的武力所震惊，而在此之前李鸿章未曾对中国外部危机有过太多的思考与了解^⑨。李鸿章不仅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威力，沪上经历还让李鸿章感受到洋人带来的威胁，让他对国家安全进行思考。

同治元年三月，李鸿章在给沈葆楨的信函中谈到对上海的认知：“沪为中外杂处之区”，“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⑩。李鸿章初步认识到沿海通商口岸中外藩篱已失，传统的华洋界限已被打破。华夷杂居造成教案频发，而洋人动辄以船舰为要挟：“各国洋人，不但彀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⑪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注意到洋人对上海存有覬覦之心。同治元年七月，李鸿章注意到新闻报纸中出现“上海各国人众，设有事故，何人管束，不如将上海地界全归外国管理，与华官无涉方才周妥”的言论。他意识到上海地区被洋人势力渗透已深，然而洋人却仍不满足，“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惟所欲为，不过关税捐厘仍为华官收放耳”，“难保无他日占据”^⑫。因为洋人有覬覦之意，李鸿章一直对外国军队有防备之心。为抗击太平军，外国军队提出协防，而李鸿章提出将洋人协防限制在通商口岸，其他区域“不应派令驻防，致启覬覦”^⑬。

鸦片战争后，与中国相隔万里的洋人从海上而来，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直接深入中国内地，对清政府构成巨大威胁。清政府自以为安全的海洋防线已经不再安全，洋人依靠轮船游弋于中国沿海，成为沿海乃至内陆安全的新威胁。李鸿章分析洋人特点，认为“洋人最喜伺喝挟制”，“洋人好恶，性与人殊”^⑭。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西洋人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盖目前之患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抚髀太息而已。”“外夷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

⁶ ①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续修四库全书》第418册，第330页上。

⁷ ②《恭谢天恩折》（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恭谢天恩折》（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册“奏议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页、155页。

⁸ ③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海军》，刘广京、朱昌峻：《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⁹ ④刘广京认为，“没有征象表明，在此之前李鸿章曾经对于中国外部危机有过太多的思考，或是确有充分的了解”（《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事业的形成阶段1823—1866年》，刘广京、朱昌峻：《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第26页）。

¹⁰ ⑤《复沈中丞》（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¹¹ ⑥《代李宫保复总署书》（同治三年），赵金晨编：《丁日昌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79页。

¹² ⑦《上曾制军》（同治元年七月十九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104页。

¹³ ⑧《上曾中堂》（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141页。

¹⁴ ⑨《上曾揆帅》（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一日）、《复应宝时》（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126页、271页。

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⑮

对威胁国家安全的洋人，应该抱持何种态度？李鸿章认为应该“刚柔并济”。同治元年六月，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李鸿章认为前任巡抚薛焕对待洋人的方式不当：“薛公驻沪多年，与洋人踪迹甚疏，事事讲究体制。”他推崇曾国藩刚柔并济的态度：“吾师威望为西人所慑，调剂于刚柔之间，当能为国家增重。”他还点评了总理衙门与一些地方道台对洋人的态度：“总理衙门似趋柔和，须外有重臣阴持其柄也。”“沪道媚夷，失之过弱，汉道抗夷，失之过刚。”^⑯李鸿章认为，要对洋人刚强持重，就需要倚仗，倚仗的基石就是轮船、火炮，“夷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夺魄”^⑰。

(二) 邻国日本自强以自立

李鸿章对周边环境保持关注，日本变革后引起的西洋国家对日本态度的变化给他以极大触动。这在他写给曾国藩的信函中多有体现。同治二年三月，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中提及，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他认为“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⑱。同治二年四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再次谈到，“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英国人虽然“临之以兵”，但因为“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竟让英国不敢轻举妄动^⑲。

同治三年，李鸿章上书总理衙门，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主张效法西洋。而日本成为李鸿章论证自己主张的最好例子。西洋国家东来，对东方国家有覬觐之意，日本则在向西方学习后，让英、法不敢轻易动作。“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两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器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李鸿章对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怀有戒备之心，“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藪”^⑳。他意识到崛起中的日本将给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带来变数，唯有中国自强，才能免于被日本和西人联合窥伺^㉑。

维新的日本、崛起的日本刺激李鸿章建议清政府进行变法。“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㉒李鸿章还主张拉拢日本，同治三年八月，他在给亲信应宝时的信函中表示：“日本来中国通商，乃意中事，中国已开关纳客，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绝，然未始不为西洋多树一敌。”^㉓他认为海禁大开后，日本迟早要与中国通商立约，不如接受日本，以对付西洋国家。这是李鸿章最早表露出的“以夷制夷”的思

¹⁵ ①《复徐寿衡侍郎》（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复朱学院》（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262页、413页

¹⁶ ②《上曾制帅》（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上曾制帅》（同治元年六月十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96页。

¹⁷ ③《上曾中堂》（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220页。

¹⁸ ④《上曾中堂》（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218页。

¹⁹ ⑤《上曾中堂》（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220～221页。

²⁰ ⑥《致总理衙门》（同治三年），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313页。

²¹ ⑦李细珠认为，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深刻剖析近代中西日三方面的国际关系大势”，“他曾敏锐地指出，日本在地理上远西近中，在中西两极竞争的格局中，中国能否自立、自强，将直接决定日本‘附丽于我’还是‘效尤于彼’的向背”（《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1期，第177页）。

²² ⑧《致总理衙门》（同治三年），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313页。

²³ ⑨《致应宝时》（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336页。

想。

二、务实的国防革新举措

在江苏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西方军火、轮船的巨大威力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让他对中外军事装备差距有了直观的认知。李鸿章意识到应当学习制造西方武器装备。同治元年十二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提到：“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他表示，“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偷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²⁴。同治二年三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说到，“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²⁵。

抵沪后，李鸿章就“购买外洋各种军火，尽心研究”。他发现“外国火器洋枪、火药、铜帽等，其最能制胜者，乃系炸炮”，故而将学习制造的重心放在“炸炮”上。同治三年已造出“长炸炮”与“短炸炮”，同时他还仿制“炸弹”。李鸿章意识到，泰西各国“所凭借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²⁶。除了火器，他也注意到了轮船的重要作用：凭借轮船，“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这也进一步促使李鸿章决意“求洋法、习洋器为自强张本”。然而，中国国库空虚，若大力发展造船也会遇到一些问题：轮船耗费巨大，“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不惜数千百万之赏财，竭亿万众之心思，积一百年之功力，乃能坚固若此”；中国是传统的陆防为主的国家，重点发展海防将会面临众多非议，“中国用兵日久，财赋空虚，又陆多水少，素不讲求，一旦改弦更张，智者虑其难成，愚者诧为多事”。鉴于此，他主张先造其他洋器，将耗费甚多的造船暂且搁置，“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²⁷。

然而，在后来平乱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让李鸿章搁置造船的想法开始动摇。同治四年二月，李鸿章给左宗棠去信谈到在追击白齐文之时，洋人助清军的商船不甚便利，“至今日通行之轮船皆商船也，只能装货载人，不能多安炮位，雇用堵剿亦虚声吓贼耳，其实不足御敌。陆军乘坐游击则多不便，仍须登岸，乃好施展”。而洋人的军用轮船，清军则很难借用，“外国真正兵轮船系其官家利器，断不肯雇借”²⁸。面对只能租借洋人商船而兵轮船难以租借的局面，李鸿章认识到，长期租借洋人的轮船是不可行的，真正的出路是清政府拥有自己的轮船、军舰。

同治五年五月，左宗棠奏请“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设局试造轮船”²⁹。有学者认为左宗棠主张建造福州船政局的举动“对李鸿章显然是个刺激”，此后李鸿章开始在上海筹划造船³⁰。其实不然。左宗棠在奏折中提到朝廷内部不少人反对造船，“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³¹。李鸿章正是其中的“议其多费”者。他不主张此时就大举造船，造船耗费甚巨是其反对的主要原因。获悉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试造轮船的奏折后，他对左宗棠的主张并不看好。同年十月，他在回复友人的信函中就透露出这一点：“左季翁轮船一局，事大费繁，颇劳经画。”³²当月在给湘军将领蒋益沣的信中，他只是客气表露对左宗棠建造大轮船构想的良好祝愿，“前见左季翁三省合造轮船之议，私心大慰，以望有成，复得阁

²⁴ ①《上曾中堂》（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186～187页。

²⁵ ②《上曾中堂》（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218页。

²⁶ ③《致总理衙门》（同治三年），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311页。

²⁷ ④《代李宫保复总署书》（同治三年），赵金晨编：《丁日昌集》下册，第879页。

²⁸ ⑤《致左制军》（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367页。

²⁹ ⑥《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3册“奏稿三”，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52页。

³⁰ ⑦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3页。

³¹ ⑧《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3册“奏稿三”，第55页。

³² ⑨《复徐树人》（同治五年十月初五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450页。

下英思伟识，戮力维持，何图不就”。随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现在发展造船的时机不甚成熟：“去秋即于沪上设置铁厂，购办机器，初意兼造枪炮、轮船，屡与总署函议，嗣因轮船体大物博，未易较短絮长，而洋枪、炸炮为陆军最利之需，乃令现行制造，借为入手之次第，并以俟物力之充裕。”^{①33}

李鸿章赞同左宗棠等人提出的设厂造船建议，也了解此时国家财力不足，难以实现。如何基于国家的实际情况，尽快发展轮船制造？他分析到，轮船本身差异较大，所耗费财力不同：“惟外国兵船、货船其式各别，就兵船而论，大者可容千数百人，载炮数十尊，一船动值数十万金，一日费须数万，海口既不能容，中国亦难学步。”考虑到现有的财力，他建议先造“根砬子”——“就其较轻易者，外国所谓‘根砬子’，即华言小炮划，亦能载大小炮数十尊，江海可行，造用皆便，鄙意欲注力于此。”^{①34}李鸿章主张先发展军用船，由于之前左宗棠在《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提出“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穷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他担心左宗棠会为解决海运问题而造货船，委婉提醒，“装货轮船笨重，不宜用兵，闽中议造者若系货船，恐费多而不适用”^{①35}。

同治十一年正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曾剖析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兴造轮船、兵船，实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是以鸿章于同治四、五年创议铁厂时，左公已先议造船，鄙意未敢附和，但主仿造枪炮军火，谓可自我发而收之也，即不备于水而尚有备于陆也。”^{①36}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李鸿章的务实态度。在这一时期，李鸿章主张将军事装备制造的重心放在枪炮军火上，并考虑适量造一些“根砬子”类的军用轮船。

三、“备夷防变”：“大国防安全”设想的生产

同治六年正月，李鸿章被授湖广总督^{①37}，离开江苏前往河南、山东等地平定捻军。同治六年九月，由于《天津条约》十年修约期限将至，为防重蹈第二次鸦片战争覆辙，清廷“思患预防”，下旨“总理衙门奏豫筹修约事宜，请飭滨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将军、督抚大臣，各抒所见”。因李鸿章“经理有年”，总理衙门又特意致函，征求他的看法^{①38}。李鸿章参考曾经的下属、现任苏州藩司丁日昌的意见，于十二月初四日上《筹议修约事宜折》^{①39}。奏折既包含李鸿章对修约一事的看法，也包含其办理洋务、“推广自强”的具体建议。其时太平天国基本被平定，捻军大势已去，中国内陆趋于稳定，但仍然面临西洋国家的威胁。

³³ ①《复蒋芑泉》（同治五年十月初七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450页。

³⁴ ②《复蒋芑泉》（同治五年十月初七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450页。

³⁵ ③《复蒋芑泉》（同治五年十月初七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450页。

³⁶ ④《复曾中堂》（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13页。

³⁷ ⑤李书春：《清李文忠公鸿章年谱》，王云五：《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2～23页。

³⁸ ⑥《筹议修约事宜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议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5～166页。

³⁹ ⑦李鸿章同时还将丁日昌的意见上报朝廷，即《密陈丁日昌拟议修约片》《附丁日昌条陈》。就任江苏巡抚后，李鸿章积极投身于军事装备制造为核心的洋务运动，而一直在办理洋务、思维活跃的丁日昌对其国防思想影响很大。丁日昌与李鸿章共同出身曾国藩幕府，都热心洋务，二人私交甚笃，李鸿章的诸多思想都受丁日昌的影响。邱志红认为，“李鸿章不仅是丁日昌的伯乐，对其仕宦发展多有推动和提携，在洋务、吏治等事业上，二人也是志同道合，相互砥砺”（《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关系探微》，《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丁日昌办理洋务的能力也得到李鸿章的认可和赞赏，同治三年五月，李鸿章给应宝时的信函中就曾对丁日昌的洋务能力大加赞赏，认为“将来大有可为”（《复应宝时》，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第319页）。李鸿章“备夷防变”思想形成亦深受丁日昌影响，李鸿章在其奏折中也提到，丁日昌条陈“精思伟画，多中窾要，足补臣疏未尽之意”（《密陈丁日昌拟议修约片》，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议三”，第170页）。

为了防备洋人侵扰，李鸿章此奏折中还提出应对外来威胁与挑战，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固的“备夷防变”^{④0}的构想，也是一种意在维护国家安全与既有体制的“大国防安全”设想。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数年，江苏经历也是其“备夷防变”构想的促成因素。

(一)以河海为基础的本土安全维护策略

1. 内河航运的重要性

洋人的海上实力远胜于中国，洋人船舶不仅在中国沿海自由活动，而且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条约后进入长江。中英《天津条约》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进出货物通商之区”^{④1}。咸丰十一年，《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规定，通过上海海关领取“江照”，船舶可以驶往镇江以上的长江上游^{④2}。长江航运权的丢失让李鸿章感到担忧，他认识到洋人不满足于凭照进入长江，“屡往探水，颇欲任便出入”。他还深刻认识到内河航运权一旦被洋人控制，则影响国防安全，“弛日后军国之防闲，关系利害极重”^{④3}，因而主张对内河航运权要紧抓不放。

2. 沿海水军计划

在李鸿章、丁日昌的谋划中，海防是二人关注的重点。奏折中分析了中国的海防形势——海防装备落后，战斗力薄弱。“然自海氛构衅，中国水师无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即沿海炮台亦呆子而无用，沿海兵制亦散而无统。”因而，李、丁提出“创建轮船水师”，并“分为三阆”，“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这是最早的近代化海军建设方案。

(二)国防安全部署的扩展——由本土到海外，由被动到主动

1. 将海外华人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海外华人也被李鸿章、丁日昌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在西方国家，商人与国家互为辅助，“夫泰西之于商人，皆官为之调剂，翼助国家攻战之事，商人亦时辅其不及，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中国亦有大量人员在海外，“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十余万人，吕宋约有三二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十数万人，檳榔屿约八九万人，新老金山约有三二十万人”。中国派员至这些华人聚集地有诸多好处，华人和官员可以相互扶持，“若中国精选忠勇才干官员，如彼国之领事，至该处妥为经理，凡海外贸易皆官为之扶持维系，商之害官为厘剔，商之利官不与闻，则中国出洋之人必眷恋故乡，不忍为外国之用”。不仅如此，还可“仍令该员于该处华人访其有奇技异能，能制造船械及驾轮船并精习洋枪兵法之人，给资送回中国，以收指臂之用”。海外华人利用得当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助力，“我中国使臣若能联络鼓舞，定可欣然效命，盖中国多得一助，即外国多树一敌，况本系中国之民，而中国自用之，有不如水之赴壑者乎”^{④4}。

2. 分派“明使”与“暗使”前往各国“行反间”

传统兵法中有离间之计，“间者，儒者之所讳言而兵家以为至计也”。泰西各国联翩东来，“虽夜郎么么之国，亦敢与汉

⁴⁰ ①《筹议修约事宜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议三”，第167页。

⁴¹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7页。

⁴² ③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75～177页。

⁴³ ④《附清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议三”，第168页。

⁴⁴ ⑤《附丁日昌条陈》（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议三”，第173～174页。

比大”，正是逐利所致，“如蚁附膻，故其势聚而心合”，这也是中国受到欺凌的原因。这种“小人之情”，“以利而亲者必以争利而疏”。再者，各国“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同处欧罗巴以西，彼强则此弱，此强则彼弱”，各国因为“平分中国之利”而“有同心”。要解决如今中国面临的西方威胁，“莫如破散泰西之交而使之自斗”。基于此，丁、李二人认为可以选派使臣分驻各国，“渐与狎习，既以通中国之情款，即以携彼族之交欢”，并提出应特别注意美、布(德国)二国，好好谋划，那么不出几年“彼族当自启兵端，狺狺而争矣”。此项建议实际上蕴含着利用各国矛盾使其相互制约的思想，也是“以夷制夷”策略的体现。李鸿章还提出不可派遣外国人为中国使臣。针对总理衙门在同年提出的邀请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前往欧美各国交涉，李鸿章虽然同意，但认为“此次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国人充当中国使臣”^{④5}。

李、丁二人不仅提出派遣“明使”驻扎各国，以离间泰西各国关系的构想，还提出派遣“暗使”“潜访该国”，寻找那些“通洋枪兵法、制造船械”技艺，并且熟悉各自国家情形而“有怨于彼国者”，予以招揽，“优予爵禄”，不仅能“习其利器之秘”，还能“得彼之虚实”^{④6}。他们的提议虽未被清政府立即采用，却具有前瞻性。几年后，秘鲁虐待华工一事发生后，清政府开始陆续派遣使臣前往海外。

3. 安抚沿海附近各国，创造良好周边环境

对于中国沿海附近国家，李、丁二人做了区别——日本与藩属国，主张对二者采取不同的策略。日本“阴柔而有远谋”，地理位置上与中国较近，“可以朝发夕至”。为防止西人“绳以中国之弱，使鹬蚌相持，而坐收渔人之益”，他们主张秘密派遣妥善人员，“佯为经商”，“伺其举动，抑或由沿海疆臣与为联络”，明面上与日本交好，暗地里做好准备。对于高丽、暹罗、安南、缅甸这些藩属国，应“遣员抚辑”，坚定这些国家目前的向化之心，争取其对中国支持呼应，“未雨绸缪，为他日首尾之应”^{④7}。

李鸿章与丁日昌不希望中国一直国门大开、与洋人立约通商，其国防战略目标是“一俟中国自强之后，不惟可以闭关绝市，且可统我海外，如新加坡、槟榔屿、新老金山各处华人，以耀威于西土矣”^{④8}。李鸿章也意识到以上构想“自是远大之谋”，且“目前未能一一举行”，可以“酌量缓急轻重，次第设施”，对时局“当有裨益”^{④9}。

四、结论

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并出任江苏巡抚，这期间的经历对李鸿章国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让他对洋人东来造成的国内外新局面进行思考。李鸿章认识到中外藩篱已失，洋人对中国多有覬覦。不同于清廷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他认为“长久之患在西人”，西洋才是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对待西洋人应“刚柔并济”。李鸿章还留意到邻国日本的变化，日本奋发自强以自立，将来“附丽于我”还是“谋我”取决于中国能否自强。在江苏平叛之时，李鸿章见识了西方枪炮、船舶的巨大威力，决意学习制造西方武器装备。鉴于中国财力匮乏，李鸿章主张将军事装备制造的重心放在洋枪、洋炮上，轮船次之。在左宗棠等人提出积极发展轮船制造的主张后，李鸿章提出建造“根砬子”类耗资较少的军用船的两全之法。

就任江苏巡抚后，李鸿章积极投身于军事装备制造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主持洋务的丁日昌对其影响很大。江苏巡抚任上的经历也帮助李鸿章思考应对外来威胁与挑战，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固的方法，其“备夷防变”思想应运而生。李鸿章的“备夷防

⁴⁵ ①《附清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议三”，第168页。

⁴⁶ ②《附丁日昌条陈》（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议三”，第175页。

⁴⁷ ③《附丁日昌条陈》（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议三”，第175页。

⁴⁸ ④《附丁日昌条陈》（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议三”，第175页。

⁴⁹ ⑤《密陈丁日昌拟议修约片》（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奏议三”，第170页。

变”思想是一种“大国防安全”设想，不仅为了防备夷人维护本土安全，也为了保护藩属，捍卫宗藩。李鸿章的设想不仅包括以河海为基础的本土安全维护，同时涉及一些海外部署。他认识到内河航运的重要性，主张对内河航运权紧抓不放；针对海防安全，他建议创建北洋、中洋、南洋三路轮船水师。李鸿章主张将海外华人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分派“明使”与“暗使”前往各国“行反间”；还主张安抚沿海附近各国，坚定他们的向化之心，创造良好周边环境。这些设想在后来基本得以实践。

同治初年，李鸿章将西洋国家看作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他意识到发展海防的重要性，却并不主张立即突破原有的以陆防为主的传统防御体系，不主张大力发展造船。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对国防战略重点的判断发生变化，对日本产生警惕，故而在同光之际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中，力持海防主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